

符号学新视野丛书

孟 华 主 编

红楼梦

一个诗性的文本

薛海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符号学新视野丛书

孟 华 主编

红楼梦

一个诗性的文本

薛海燕

著

AB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一个诗性的文本/薛海燕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
(符号学新视野丛书)
ISBN 7-5004-4142-8

I. 红… II. 薛…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0380 号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王华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226 千字

定价 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题记：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

英文摘要

Title: Dream of Red Chamber, A Poetized Text

Key Words: Dream of Red Chamber, Poetized Text, innov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nova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RC) an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m & prose inditing. Starting from “truth”, “vulgarity”, “fem” and “feeling” etc. in DRC, I meant to explore the essential meanings of these conceptions mentioned above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raditional “shi-liu-yi” (“诗六艺”) and wenzhangxue (文章学); I studied “truth”, “vulgarity”, “fem” and “feeling” of DRC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novel history, then argued that the inditing of novel-by-literator had been being effected by elegant genre such as poem, prose, history etc. since Sung Dynasty, that novelists transform “vulgarity” into “elegance” by “to mean elegance from vulgar discourse”, and Cao-Xueqin was the greatest practitioner of them.

Author: Xue Haiya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序 言

王 蒙

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浩如烟海，给人们的启发和教益是多方面的。有的研究大处落墨，成龙配套，将虚虚实实、千端万绪、有时候见头不见尾、有时候令人一头雾水的小说故事与处理手法梳理成最进步的历史社会思想观念，使之归属于已有的完整的理论系统，六经注“梦”，“梦”证经典，六经治（理）“梦”，“梦”弘经典，六经圆“梦”，“梦”颂经典；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既显示了经典的无所不包，也显示了“梦”的无往不适。把弘经与弘“梦”结合起来，这也是研究者的智贤之士的薛宝钗式的“时”的有效发挥吧。

可惜的是它只能证明已有的结论，用已有的结论分析小说，用小说证明已有的结论，带有循环论证，互为前提，互为结论的色彩。

有的则着力于训诂考据，大开眼界，大长知识，也使对“梦”的所谓文本研究更加复杂艰巨。哪一段哪一回哪一卷是真本原本，哪一段哪一回哪一卷是讹是贗是另有隐情别情都弄不清，还怎么侈谈文本？为此，作为“梦”书爱好者，我十分感谢对此书及其作者、背景作了大量考证的学者的贡献。同时，我也深感“曹学”、“版本学”等的能掌握的材料、证物、证据太少，谜团太多，等待结论的太多，结果许多断语其实是出自论者的猜测乃至好恶，出自论者的感觉、灵感、个性，再辅以材料甄别与

逻辑论证，主观倾向往往胜过客观实证，从一分材料得出十分结论，至少九分属于“风险投资”。你无法因“梦”的版本、作者、背景的尚有争议尚待考证而暂停文本研究，无法等待一切考证齐活再去触摸文本，你就依靠一点点已有的背景知识大谈文本却又给人以无知妄言或者逃避考据的“硬”功夫，乃向着阻力最小的文本评说卖弄起来的感觉。

或谓“梦”的研究的特殊性与要点在于从中进行中华文化的研究与弘扬，善哉斯言！随着历史的曲折进程，新世纪的国人们与上个世纪不同，愈益知道了中华文化这本大经的重要与美丽。谁能捧“梦”而忽略文化的中华传统特性，谁能谈中华文化而不谈《红楼梦》，爱中华文化而不爱《红楼梦》？

怎么样从传统文化的角度逼近与把握《红楼梦》，则是学养欠缺如王某者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东读西看，鳞鳞爪爪，碎玉散珠不少，系统地考察探寻则不多，更不深不透。莫非“梦”的文化内涵就在那些细物用品风俗名称的冷门细节偏题上，而不在全书体系之中？“梦”如大海，莫非“梦”的文化不在于海水海浪海潮而只在于一沫一沙，一藻一虾？当然细节的知识性趣味性问题也是需要搞明白的，也是惠人良多的；但是《红楼梦》中的文化当不就是点点滴滴零零碎碎的堆积，而应有其整体性，应该是全书的思路、观念、感情、精神架构、价值选择、来龙去脉、符码体系所凝聚的。什么时候能有一种能够贯穿全局，不遗细部，正面回答《红楼梦》的文化性格问题，中西学兼有而中学为体的既是全面的大气的、又是细腻的敏锐的感觉精微的论著出现呢？

接触到中国海洋大学的年轻的女教师薛海燕博士的红学新著《〈红楼梦〉：一个诗性的文本——论〈红楼梦〉的令世人换新眼目》书稿，颇有些喜出望外。它确实部分地满足了我多少年来的上述认知饥渴和阅读期待。作者有意识地不采用一般西方文论特

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中的人物、结构、情节、语言几大块的析方法，也不跟随拔高上纲的理论提升路线，不拘泥于已有的各大名家的红学主旨，而又充分照应了当今各路红学好手们的卓见高评；紧紧抓住书中的几个关键的命题，几个关键的语、词、字，继承了中华治学的字句分析考究的古老传统，旁征博引，追根溯源，参考百家，联系全书，联系中国传统的特别是诗文（即不限于小说）的与明清历史文化渊源，做出自己的既不人云亦云，也不故意唱反调的，既是相当独出心裁的，又是相当合情合理的，我甚至要说是平易近人的，却又与众不同的论断。读之，每感深得吾心，又每感深益我学，乃庆幸我之先睹为快，有不能已于言者。

例如，作者说：“近代以来思想启蒙的文化使命，使大家一直有意无意地抬高《红楼梦》的思想性……难免有削古人之足以适今日之履的嫌疑。”作者明明白白地分析了“梦”中扬女抑男的种种说法与近现代男女平等思想之间的重大区别，并援引了明清时期已经一再出现的类似的扬女抑男的说法。这是很大胆的论断，但又是很有根据的说法。与此同时，作者对贾宝玉的分析与强调他的反封建、叛逆性格论者不同，而是指出他的“不以现实价值和意义要求生活，而能寻求有韵味和独得之乐的生活方式”，指出宝玉“放弃强势而选择弱势，放弃攻势而选择守势，放弃功利而选择审美”，并从宝玉的只管当前，只管瞬间的倾向中寻找杨墨思想的迹象，应该说这些都具有原创性与说服力。再如作者对于薛宝钗并非阴谋害人的论述，都比较体贴事实，也符合我个人的一贯阅读观感。

作者强调“梦”的“以诗文为小说”的写法特点及其意义，充分考虑《红楼梦》的雅俗共赏特点，考察《红楼梦》联结雅俗的方式。强调超越俗言的解读规则的重要性。例如作者认为“梦”中的“女儿”，总是与诗联系在一起的，女儿与诗互为符

号，甚妙。这也使人们对于“梦”的意淫说，对于理解《红楼梦》爱情描写性描写从欲望的层次升华到审美的层次有很大的意义。对于理解与感受林黛玉这一人物也很重要。

作者以相当的材料论证指出明清小说有对小说的礼教和伦理教化内涵持淡化或虚无化态度。这就使《红楼梦》的出现变得有迹可寻。我尤其得益于此书的是作者对于中国小说言俗而意雅、言此而意彼的状态和由来的分析，它们涉及了中国特色的小说学流变而且涉及了中国雅文学、中国诗文的一些根本特点，它们包含了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把握也直指中国文艺学的研究，可算站得高，视野远，而又尊重事实的各个侧面了。

以我为例，知道“车、别、杜”却不知道清朝写《蜃楼志序》的罗浮居士。于是见到他对于小说与大言之异的辨析，便深感雀跃。多年前我曾经反感于对小说只写杯水风波、只写小男小女小猫小狗小*……的指责，指出“别忘了还有一‘小’，就是‘小说’，否则改成‘大说’好了。”这回好了，薛博士的论著里的材料证明，中国历史上早就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了，中国文艺学小说学远不是那么寒碜，颇可观也。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说“谁解”二字既是期盼也是绝望。呜呼，何知曹之深也！

晴雯补裘，作者认为忍心令其抱病劳作略略脱离了宝玉“女儿至上”的性格逻辑，此论令人一震。作者又从补裘想到修旧如旧的象征意义，从修补描写之细拈出“界线法”，想到全书的补天主题，分析“梦”的“批判现实主义”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之别在于一个模糊“我”与现实的距离，一个强调这种距离。同时“梦”的结构又有别于西式象征主义，前者强调，而后者模糊象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从结构的民族性这一大角度，作者指出《红楼梦》的时空格局的循环性与求真求实精神的淡漠与缺席。这些论述牵扯到一些重大的文学史与文艺学问题，论之亦大矣！

这种有想像力的治学，也令人称快称奇。其实，象征的力量恰恰在于它可能突破原作者自己的设计，而这种能指的后面有着几乎是无尽的所指的创作，其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几乎无尽的可想像性，可寄托性，可分析性。但是，遇到呆板的，头脑拴到一根绳子上的读者，再好的作品也没有用了，再好的理论也无计可施了。

此书对于“荒唐言”之“言”，以及“意”、“言”、“文”三者之关系，对于“时宝钗”之“时”，对于“情不情”、“情情”、“无情”之“情”以及“情”在儒家思想中的作用，对于林黛玉之“思家”与封建的“家国”观念，对于“女儿”与“水”，关于探春的“兴利除宿弊”与兴利、争利、享受三者间的关系，对于“网状”说的林林总总的论说，都可圈可点。

这是一部认真做学问的书，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读之，你当为作者的硬碰硬的治学努力所折服。这又是一部颇有灵性的书，学问认真但绝不呆气，而是灵动有致，时见珠玑。这是一部独立思考，很有头脑的书，读之获得一种智力的享受。如果说还有什么期待，那就是文献问题过于回避，个别论断尚嫌生硬，大量学问也还有待更好地消化与融会贯通，非常博士的文体也还可以向更娓娓动人的叙述方面过渡一下。学而时习之，其乐何如！

前 言

读硕士期间，曾经想过作《红楼梦》方面的毕业论文，被导师袁世硕先生否定了。原因很简单，这方面的研究太多，不容易出新意。后来曲阜师范大学的张稔穰先生请袁先生去参加其弟子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内容是比较《红楼梦》与西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之间的异同，袁先生对之评价颇高。我由此领悟到先生并不一味反对研究《红楼梦》，相反，他很重视有关《红楼梦》等经典作品的研析于文学史研究之意义，乃至于中西文学对比研究之意义。

博士论文（《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写到“女性观”一部分，导师郭延礼先生再三提醒我不要写得太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大女子”化，要尽量切实具体地梳理古人（尤其是文人）有关情感、婚姻、家庭、女性等方面的认识。考察对象中包括明清文人妇女观，《红楼梦》的女性观当然也在考察之列。我的感觉是，《红楼梦》写女性的方式、态度与明清女性文化相对高涨（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才、艺素质提高）和当时文人相对尊重女性的普遍态度（重情、欣赏女性才华等）有关，也与古代文学写女性的传统（如“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有关。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分析文学如何“写”女性，应与关注古人如何“谈”女性和具体对待女性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而且文学“写”女性的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具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女性作家

的创作心态、创作方式。^①当时因时间和学力都有限，我在论文中主要讨论了《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之间的联系，^②而对其中女性形象和塑造方式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则未及深究。^③念念于兹，总想有所补救、修正。

毕业后在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执教，讲授《中国文学史》明清部分等课程。为使同学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系统的认识，我在作品选讲中总是紧扣作品在文体发展角度的意义给予解析。久之，逐渐对文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对此形成了如下直觉式“感悟”：第一，文学作品越写越长（文体由诗到文，再到小说等，越来越长），这是世界通律；第二，越长则文学的表现内容越丰富，而语言也就越不凝练，越接近日常语言（乃至于今天“网络文学”充斥着语言“垃圾”）；第三，在越写越长的同时，中西文学都有抗拒文学语言日常化的需要，而措施、意义不同；第四，表意汉字所孕育负载的中国文学尤其崇尚凝练、以少驭多，这样的要求最集中地体现于诗，而各种文体在发展成熟后都有“诗化”倾向，从而诗成为中国文学的“母体”（不仅在时间先后意义上），故而研究小说等不能忽略其所受诗歌创作传统的影响；第五，研究中西文学在表现内容日趋丰富的同

① 有关“女性文学”的三种界定：女性作家作品、写女性的作品、女性作家创作的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如果考察写女性的传统（文）——女性作家作品（言）——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意）三者之间的互动，对研究文学传统或发扬女性写作当都有真正助益。

② 后来将这一部分独立成文，题目为《〈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二辑。

③ 为研究方便，当时我将“女性文学”的研究内容限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而写女性的作品并不是论述重点。答辩中，刘世德先生建议不要忽略写女性的作品，意见相当中肯和有建设性，特此致谢。

本书《“令世人换新眼目”与“使闺阁昭传”》一章即专门讨论了《红楼梦》中“女儿”形象塑造与比兴传统之间的关系。

时,抗拒语言日常化、“垃圾”化的不同措施、机制,当是文学比较的核心和捷径;而研究具体作品对待语言和文学传统的态度,也应是考察其在文学史中地位、意义的重要方式。在如上认识基础上,我从文学传统研究《红楼梦》或女性文学的欲望、兴趣更加高涨。

2001年,同事孟华教授有意主编“符号学新视野丛书”,我从其言论和《符号表达原理》论著中都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比较和文化反思精神,由其符号学体系和分析方式中更受益良多。切磋中,我逐渐认识到,汉字本身相对于西方表音文字有着非线性特点,更强调结构内部关系,因此文学作品也经常有着“互文”结构,“长”者“形散而神不散”,“短”者则“言有尽而意无穷”。总之,在“形”、“言”之外,概有“神”、“意”存焉;而这个“神”、“意”,排斥文学语言之日“常”化。我的感悟由此找到了理论和学术的立足点,摆脱了“说长道短”的表面层次。

《论语》云:“不学诗,无以言。”过去人们大多认为这段话是在提倡学诗(《诗经》),以增加学识和修辞能力,提高发言水平。而从“言”、“意”关系看,“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实际上倒置了达“意”过程,强调用“诗”的固有语言模式发“言”,而推迟了本来要表达的“意”的在场。文学史上,每一种文体都来自民间而归于庙堂,来自俗言而归于雅言,民间俗言成为庙堂雅言发展的语料库和助推器,“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不学诗,无以言”由此成为诸多文体最终都走向“诗化”的预言。

20世纪,治小说史者往往把“小说”当做“市民心声”的载体,当做对抗和替代诗文等雅文学的俗文学体裁,甚至当做文学近代化的急先锋。鲁迅先生提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红楼梦》更被视为具有高度“叛逆性”和“启蒙精神”的杰作。《红楼梦》的“追踪躐迹”、

“使闺阁昭传”等被等同于西方的“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学者即使注意到《红楼梦》的“非写实”特征，也只是强调后者在“现实主义”精神之外更有“象征”或“寓意诗化”色彩，^①对其“象征”或“诗化”手法的“以诗写小说”的本质及其文学史意义却很少关注。而作为一个“诗化”文本，《红楼梦》的价值可能恰恰在于以“诗化”对抗小说语言的日常化、通俗化。

不照搬西方的小说评价体系，对受日常化语言和诗化语言两个磁场吸引的中国古代小说展开本土的、同时又是比较的研究，才能对中国“小说的兴起”及发展过程给予合历史、合逻辑的解读。

① 如周思源先生评价《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是“象征现实主义”，见其《〈红楼梦〉创作方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王艳女士的硕士学位论文《〈红楼梦〉寓意诗化文本的叙事学比较研究》强调《红楼梦》在“现实主义”精神之外更有“诗性”等。本书第六章《之二“网状结构”与“现实主义”》中对此有专门讨论。

目 录

序言.....	王 蒙 (1)
前言	(1)
绪论：红学“文献、文本、文化”融通的 21 世纪 学术转向与本书主旨	(1)
第一章 “令世人换新眼目”与“满纸荒唐言”	(19)
第二章 “令世人换新眼目”与“谁解其中味”	(40)
第三章 “令世人换新眼目”与“真假”之辩	(59)
第四章 “令世人换新眼目”与“使闺阁昭传”	(81)
之一：“女儿”与“诗”	(83)
之二：“女儿”与“水”	(110)
第五章 “令世人换新眼目”与“大旨谈情”	(130)
之一：黛玉之“思家”与“情情”	(130)
之二：宝钗之“时”与“无情”	(162)
之三：宝玉之“无事忙”与“情不情”	(184)
第六章 “令世人换新眼目”与“界线法”	(226)
之一：“补天”、“补裘”与“修旧如旧”	(228)
之二：“网状结构”与“现实主义”	(239)
主要参考书目	(275)
后记	(277)

绪 论

红学“文献、文本、文化” 融通的 21 世纪 学术转向与本书主旨

一、红学界所提出的“文献——文本——文化”（以下简称“三文”）融通的 21 世纪学术转向，根源于“心——言——文”的传统语言观，但相对而言更关注“言”和“心”，与传统语言观的重“文”和传统学术的偏重文献考索不同。这样的转变，主要根源于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和“五四”以来科学理性主义思潮（科学工具论）的冲击。

1999 年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提出会议的议题是：在面向 21 世纪的时刻，红学研究如何将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相互融通和创新。^①会议中梅新林先生对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的各自内涵和融通研究的内容给予了具体阐述：其中文献研究“主要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钩稽考证”，文本研究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

^① 参见赵建忠先生《面向 21 世纪：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99 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述评》，《红楼梦学刊》2000 年第一辑，第 232—245 页。

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文化研究则“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研究等方面”；^①而三者的融通即指“以文献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旨归，在回归文本研究中寻求以上三者的融通和创新，从而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和内学的藩篱”^②。

提出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融通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文献、文本、文化研究是当前红学中三种主要的范式（共时态），而且文献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的链条还高度概括了百年来红学发展的轨迹（历时态）。因此在世纪之交，提出三者融通确乎具有反思、整合和创新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意义。

只是，对造成20世纪红学由文献研究到文本研究、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深层动因和这一发展链条的内在规律，学界的认识似乎尚嫌不足。梅先生强调：

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产生的历

① 会议文章后来刊载于《红楼梦学刊》。参见梅新林先生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世纪之交红学研究的转型与前瞻》，《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二辑，第33—36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